



五代以后，雕版印刷遍及全国各地。南方的刻书活动相对发达，北方的刻书事业则相对受到忽视。傅增湘就认为“南方刻书之风盛”而“北地则声闻寂寞”。针对这一论点，出生于江苏江阴、毕业于无锡国专的文献学家王绍曾教授指出：“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我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发挥光大，其中有山东刻书家的一部分功劳”。

清代山东的私家刻书

■杜泽逊

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巨大。五代以后，雕版印刷遍及全国各地。南方的刻书活动相对发达，因而流传下来的印刷品也较多，受到印刷史研究工作者的特别重视。北方的刻书事业则相对受到忽视。傅增湘就认为“南方刻书之风盛”而“北地则声闻寂寞”。谢国楨也认为：“冀北鲁东，文物之邦，犹未闻有刻书之风。”针对这一论点，出生于江苏江阴、毕业于无锡国专的文献学家王绍曾教授指出：“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我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发挥光大，其中有山东刻书家的一部分功劳”。这是王先生长期在山东数十年研究得出的中肯的结论。2016年12月，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唐桂艳的专著《清代山东刻书史》，三巨册，130万字，不仅将王先生这一结论具体化并落到实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用事实回答了北方雕版印刷的成就问题，对整个北方雕版印刷史的调查研究也具有示范意义，可以说是中国雕版印刷研究的重要成果。

这部专著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清代山东雕版印刷成就的第一次系统调查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的故乡，中华民族主要元典大都出于山东。清代山东在图书的雕版印刷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本书的作者唐桂艳同志经过长期艰苦调查，首次得出科学的统计：清代山东刻书达4000多种，分布在全省十府二州107县，其中济南府最多，莱州府、登州府、青州府次之，而较为偏远的曹州府、沂州府，亦有值得称道的成就。

本书的调查结果表明，清代山东官府刻书有500多种，各级官衙积极刊刻与职能范围有关的书籍。如山东布政司刻《山东省赋役全书》，按察使司刻《山东全河备考》，都转盐运司刻《山东盐法志》，山东河道库刻《山东

运河备览》。除此之外，山东还承担朝廷的出版任务，比如曲阜的衍圣公孔毓圻主持刊刻了康熙皇帝敕修的《幸鲁盛典》，刻书地点是曲阜孔庙，当时的纂修官都是康熙皇帝亲自选派来的。

清代山东有大小坊铺120多家，刻书600多种。济南坊铺数量最多，聊城“四大书庄”叫得最响，胶东“成文信”各个分号在全国的分布最广。这些坊铺顺应市场需求，出版了大量应试书籍和文学读物，起到了文化普及和传播的作用。

清代山东的私家刻书最为发达，有3000多种，这与山东旧学渊源和文学兴盛有很大关系。经学家张尔岐、郝懿行、孔广森，小学家桂馥、王筠，史学家马骥，金石学家陈介祺、吴式芬、李佐贤，文学家王士禛、孔尚任等，都刊刻了大量个人著作。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最为精审，顾炎武来到山东，抄录一部带到山西，并作了序言。乾隆八年济阳高廷枢刊刻行世，后被收入《四库全书》，产生广泛影响。整个清代《十三经读本》，《仪礼》一经大都采用张尔岐这部书。

马骥《绎史》，是上古史的名著，刻成于山东，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关注，以白金二百两将版收入内府。翟云升的隶书名著《隶篇》，刊刻于掖县家中，当时延请专门人才，使该书成为雕版印刷的精品。日照许瀚则用半生精力校刻曲阜桂馥的遗稿《说文解字义证》，使该书在作者去世近50年后得以行世。淄川蒲松龄的名著《聊斋志异》，在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由另一位山东人莱阳赵起杲刊刻行世。著名文学家王士禛，一生著述等身，先后刊刻著作70余种，后代汇为《王渔洋遗书》流传于世。辑佚第一大家历城马国翰，刻书800多卷，书版约6000片，至今保存完好。

山东学者所到之处，以刊印典籍为己任。德州卢见曾曾在扬州刻《雅雨堂丛书》。益都李文藻在广东刻印江永、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的著作，由周永年汇印为《岱园丛书》传世。而孔继

涵则把戴震的遗著带到曲阜家中刊刻为《戴氏遗书》行世。这说明山东的私家刻书活动，与其他省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除了官刻、家刻、坊刻之外，青州法庆寺、济南灵岩寺、泰安普照寺、青州浸礼会、山东公善堂、山东广仁局等宗教机构和民间团体也参与刻书。可以看出，雕版印刷在清代北方尤其是山东的繁荣程度，并不亚于江南，正如王绍曾先生所说：“山东的刻书之风，虽然对全国来说不是什么中心，毕竟在版刻史上还占有一定的地位。”

可以说，有了《清代山东刻书史》这部书，清代山东的刻书成就基本上可以有案可稽了。

二、雕版印刷史调查研究方法的新探索

《清代山东刻书史》在地域雕版印刷史研究的方法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在方法论上为同类研究提供了借鉴。

第一点是发挥地缘优势。尽管清代山东很多重要出版物流布全国甚至海外，但大量的一般性的出版物还是以山东省收藏为最多。所以，山东雕版印刷史的研究首先要依靠山东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收藏。本书作者长期供职于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有条件对全省的古籍收藏进行调查，具有做这一课题研究的先天优势。作者从事古籍整理20多年，对中国出版史有全面深刻的认识，能够从全国的角度考察山东刻书，可以说研究山东刻书史是轻车熟路，胜任愉快。《清代山东刻书史》是作者知识结构和资源优势相结合的产物，其他地区的雕版印刷史研究均可照此办理，这样形成的成果当是非常可观的。

第二点是用更广阔的视野界定研究范围。中国幅员辽阔，学者文人跨区域活动，跨区域著书立说，其刊刻出版也必然是交叉的。像戴震的《戴氏遗书》在山东曲阜首先刊刻，而王士禛的著述陆续刻于京师、扬

州、广东、金陵等地，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刻于山西，郝懿行的著述一部分刻于直隶东路行署。到底如何界定山东刻书，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刻书绝不仅仅是一个雕版问题，它包括出资和版权、编辑和校勘、刊刻和印刷、存版和流通等各个环节，要从著者、编者、出资者、雕刻者、印刷者各个方面通盘考虑。其中，出资者最为关键，因为他主持、主导刻书，拥有版权。所以，出资者是山东人，无论雕刻地是否在山东，都应归为山东刻书。而外地人在山东刻的书，因为用的是山东本地刻的书，即山东人在山东所刻书以及外地人在山东所刻书，又应包括山东人在外地刊刻的非官府书籍。本书的作者明确划定了山东刻书的范围，解决了地区间的交叉问题，从而能够全面地反映山东刻书的面貌。

第三点是刻书研究与中国学术史、文化史相结合。山东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影响中国数千年，而清代的山东，学术积淀亦十分深厚。作者研究山东雕版印刷史，不仅注重与全国的学术史、文化史相结合，还注意挖掘地方的文化学术传统。如，从《雅雨堂丛书》的刊刻，探讨卢见曾推动乾嘉学术发展、引领汉学崛起的重要意义；结合阳明心学在山东聊城余脉的余脉，揭示在康熙重视宋明理学的背景下，王学传人刊刻《在邑三先生合刻》的目的；梳理方苞及其弟子、友人的刻书关系，体现桐城派在山东的传播；透过清末胶东善书增多的现象，找寻沿海文化对刻书的影响。这样的结合与分析，对探寻山东雕版印刷的地域分布规律以及发展的内在原因有很大益处。

三、版本目录学的重要贡献

据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3500万册，但真正用当代科学方法著录的古籍仍为很少一部分，大量文化遗产还有待于专业人士作出科学的著录。这是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山东刻书史》对4000余种清代山东刻书进行了准确的符合学术规范的著录，这是对古籍目录学的一大贡献。

一般地讲，对古籍版本系统性的著录比较容易做到，但要搞清楚刻书时间、刻书者、刻书地，在目录版本项以“某年某人某地刻本”的方式完整地进行著录，却需要详细的考证。作者在这方面用力甚勤。如，王筠的《说文释例》及其《补正》，许多书目著录为清同治四年刻本，这缘于书前有王筠之子王彦侗在同治四年进呈书籍的标记。作者首先查考了湖南省图书馆藏此书稿本和山东省图书馆藏此书校改本，又参考《王荦友先生著述考》《王荦友年谱》，从而弄清了《说文释例》刊刻时间和地点：道光二十八年王筠在山西徐沟所刻。至于《补正》，作者又据王筠《致许印林书》和王彦侗《蒙友府君行述》，确定係王筠于咸丰二年刻于山西乡宁，从而订正了前人著录的错误。

本书著录的4000余种清代山东刻书，每一种都经过了细致的专业性考证，因此其著录成果是对目录学、版本学的重要学术贡献。

四、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参考

《清代山东刻书史》记录了大量的刻书史料，包括书籍生产过程中的板材价、写字价、刻字价、刷印价，以及书籍流通过程中的书价，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提供了真实的直接的数据。如，乾隆十年曲阜孔昭焕等刊刻《孔子世家谱》，当时一块板子加上刻字费用为银0.38两，刻工每刻一百字的价钱是0.09两。乾隆二十五年新城王氏刻《[新城]王氏世谱》，每块板子及刻字费用约为580钱，

刷印一部需要500文，合每叶不到2文钱。许瀚刻《说文解字义证》时，写工每写一百字为45.8文，刻工每刻一百字为269文。至于售书价格，《清代山东刻书史》中记录得更多，像专门的售书目录《燕合成文信记书目录》，在每一种书后都标明价格。同一部书，大板小板价格不同，竹纸、棉纸价格也不同，粉连纸的价格就是顺泰纸的三倍。

《清代山东刻书史》还揭示了大量隐含在雕版印刷品内的罕见史料。如滕县张耕的《古韵发明》一书，内有道光六年阮元在广东节署做的序，此序不见其《经室集》。四库馆臣周永年，为文不留存稿，其文传世极罕，《清代山东刻书史》记录了他的序文共三篇，都极为难得。其中一篇是乾隆五十五年周永年为刊刻张养浩《元张文忠公归田类稿》所做的序。此序叙述了这个刻本所据底本的搜集过程：先是乾隆三十四年，李文藻告诉周永年说邵晋涵曾见过张养浩此书，于是周永年开始留意、搜求，在他和邵晋涵分任《四库全书》子、史两部纂修官时亦屡屡提及此事。乾隆四十一年，邵晋涵从汪氏振绮堂抄录一部，托罗有高捐给在四库馆的周永年，周永年当即抄一部留四库馆，成为《四库全书》本的底本，而邵氏抄本却在周永年借给他人后不幸遗失。乾隆五十三年，周永年又据《四库全书》本抄录一本，交付毛昶雕版行世，使得这个版本成为现存张养浩此书的唯一刊本。《清代山东刻书史》全文录下的周永年的这篇序言，不仅为研究邵晋涵、罗有高、李文藻等人提供了重要线索，还为读者呈现了清代乾隆年间在纂修《四库全书》的文化大背景下，学者文人为典籍的刊刻流传不辞辛苦、辗转搜求的群像，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山东刻书史》后面附有详细的索引。索引的条目包括：书名、著者、序跋者、刻书者、刻书地、刻工、写、堂号，读者寻找各方面的学术线索，都十分方便，这是此类著作不可缺少的部分，值得同行学习。

如何看传记写作——与顾农书

■陈学勇

农兄：

前闻兄牙疾，现康复如何？甚念。

顷读《中华读书报》上大文《古人如何写传记》，精彩随处可见，受教多多。兄批评当下传记写作陋习，入传人物太烂，篇幅越来越长，充斥“琐碎的细节或肉麻的自吹”，无不切中时弊，关于精选细节的分析尤其精辟。我是写过两本传记的，难免时弊熏染，惭愧不已。可惜不敢存有写作第三本奢望了，不然定引为警策。

然而大文所论尚可有斟酌处，容一一讨论。

古今传记篇幅的长与短，兄置于当下传记过长的背景来谈论，恐易致误会，似一律地短而优长而劣。社会发展，传主阅历愈加丰富，材料发现越来越多，入传的内容自然非古人所及，故传记篇幅长了许多，或情理中事。还有文言、白话导致篇幅上差异的因素，更何况，古时搜集素材何其困难，今因科技发达，素材资源充足又得之便捷。以古奇今，尚短而不能尽述其事，可能与废话连篇同样，皆有副效应。像鲁迅、胡适这些历史巨人，没有相当的篇幅，绝难显示传主全貌吧。还是常言说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前几年某部门征集古今文化名人传记书稿，规定二十万言体例，传主名单里

有蔡琰。当时你我都怀疑，谁能为此少米之炊？不知后来出了没有，出得如何。其实现代传记作品也有短小精悍的，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某地出过一套人物评传，每集十数人，每人一二万字，写得全面、简要而精到。缺憾是出书较早，受那时观念局限，作者视线略滞后。

针对传记的空洞冗长，兄借古诘今，概括了一种古代传记模式：“只记载传主的若干片段，而可读性很好，同时具有史学和文学的价值。”其疗效或顾此失彼。这样写的价值毋庸置疑，可是作为传记写法，彼一时此一时，未必合乎今日阅读期待。兄举西晋夏侯湛作《辛宪英传》例，此传简略有，怕也难以当得今日传记写作的示范。其实这样写法近百年来并非罕见，《某某二三事》的文章，三天两日得以寓目。古今传记概念有所变化，彼时记事二三即谓之传，古人这么写传无妨，今人不必刻板泥古。现在读者有理由希冀，了解传主生平要比“二三事”多得很多。兄赞赏精彩细节以见精神，此犹如优秀漫画人像，仅取相貌最突出部分，然后再优秀漫画像终究替代不了写实肖像。

兄又以《五柳先生传》为例介绍古代传记另外一种模式：“虚拟一个人物，借着他为人立传来写自传，写自己的思想风

貌和处世态度。在这种模式下一般不去写具体的生平经历，而用写意的手法勾勒一幅自画像。”传记写作诚然贵在刻画传主精神，需补充的是，刻画是建立在较为全面的生平或一段突出经历的生述上，就读者言，求得传主生平史略毕竟是基本的、前提性的。传记属叙事文体，而且自有它独特叙事要求，规范史实不言而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兄赏析《五柳先生传》，“宅边有五柳树”，特指出陶渊明住处未必真有柳树五棵。立传容许这么虚拟，不免逾越纪实底线。兄注重细节的传神，勿忘兼顾它史学属性。譬如，兄书房取“听箫楼”“玄览堂”斋号，想“听箫楼”缘自杜牧那首著名的七绝《寄扬州韩绰判官》，取意它后两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如果是兄立传，随意变作“濠上庵”，应我们这里的水景，岂没有违兄寓居扬州的人生履痕，走样了真实的顾农教授。虚拟人物，借以自况，它与纪实的传记，已经不属于同类文体。《五柳先生传》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是小说、传记体的小说，开了隋唐间“志怪”“传奇”的先河。兄归其为传记，弟担心给烂写传记的作者，援以为例，长他们“演义”传主的底气。借传记体裁创作小说，现代作家不乏其例，女作家中更有操此道的，苏雪林的《棘心》、凌

叔华的《古韵》皆是。可叹一些学者误认《古韵》是自传，无视它若干虚构成分，据之述说凌氏生平，研究她思想。

兄还提及鲁迅说过，“我不是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兄当然知道，鲁迅有过一篇《自传》的，不足千字。虽然很短很简略，却是很精要很全面。自1881年生于绍兴周家、祖遗产多少，到父亲秀才身份、母亲姓鲁，到求学南京、留学日本、回国当校长当教育部科长，到大学兼任讲师、专任教授，到回上海定居，卖文谋生、加入左联，到写自传时著作正遭查禁，流水账一清二楚。鲁迅不主张写自己的传记，自己写或别人写，谦虚当自是美德；反对传记泛滥，亦是箴言。可鲁迅未留下大家想读的自传，终究叫人遗憾。幸好他若干文章多述往事，十分生动，否则，真正愁煞欲为他立传的作者。自传写作问题似不在该不该写，应在写自传能否如史道来，不避讳不粉饰，于历史负责。

兄批评当下传记写作诟病种种，确是一针见血的苦口良言。不过愚见，诟病尤有甚者盖内容远离史实，普遍而严重，它实在是今日传记写作的致命伤。弟暑期曾往深圳作一讲座，专谈此痼疾，正整理讲座提纲，拟另外面

世，这里不再絮叨。

前告弟滑了一跤，稍不良于行。若兄得便，盼屈驾舍下叙叙，与析疑义。时又值九九，推窗望空万里。弟蜗居危楼高层，无需登高，“听箫楼”在望。都上了年纪，务切保重！问嫂夫人大安，不另。

弟 学勇 丁酉重阳日

顾农复信

学勇兄：

长信敬悉，非常高兴。咱们平时通信大抵采用兔子尾巴式的电报体（这个词陈旧了，或应称为手机体），难得畅谈。现在年轻的人或时髦人物都非常之忙，鬼鬼巴巴的也就罢了，咱们闲人完全可以不受什么限制，但竟然也都去赶时髦。

由此可知时髦的力量。写传记也是如此，大家都写得老长，幸好他若干文章多述往事，十分生动，否则，真正愁煞欲为他立传的作者。自传写作问题似不在该不该写，应在写自传能否如史道来，不避讳不粉饰，于历史负责。

兄批评当下传记写作诟病种种，确是一针见血的苦口良言。不过愚见，诟病尤有甚者盖内容远离史实，普遍而严重，它实在是今日传记写作的致命伤。弟暑期曾往深圳作一讲座，专谈此痼疾，正整理讲座提纲，拟另外面

史料有多寡，读者的要求也是各式各样的，所以传记的篇幅可以有种种不同，就如小说一样，长篇、中篇、短篇、微型，不妨同时并存，作者可以各显神通，读者亦得以各取所需。”充实而长，很好啊，没有反对的意思。问题在于现在多有并无必要的长、唠唠叨叨的长以至莫名其妙的长，看不顺眼了，于是就拿短而妙的传记来予以袭击。在这样的当口，如果我却去讲长的必要性，即使讲得很有道理，也未免古怪。对一个糖尿病人大讲蔗糖的营养，孤立地看那些议论，可能都是对的，无非是看错了人。

你举鲁迅的一份自传为例，夸奖说“虽然很短很简略，倒是精要很全面。”这话我完全拥护——这恰恰为我的主张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

关于“精神自传”，你认为是文学作品，是小说，这当然也自无不可，而它也还是传记。传记的概念似不必画地为牢。此事说来话长，我还要再好好想想，深望吾兄多多有以教我。

拙牙的问题在解决之中。假如如同一篇大文章，有得修改打磨呢。贵贱如何？多加小心为要。等我把牙齿武装好了，当择机专程拜访兄于南通濠上之高楼，好好清谈一番也。匆匆，即頌！

秋安！

弟顾农顿首再拜10.30